

自然文本:概念、功能和符号学维度

彭佳,蒋诗萍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5)

摘要:自然文本是生态符号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塔尔图-莫斯科学派宽定义文本概念的细化和拓展。较之于生物文本,自然文本的传播、记忆和意义生产功能都有所不同。此外,自然文本研究具有三重符号学维度:符号学维度、符形学维度和符用学维度,它在生态符号学研究中的作用也因为这三重维度而各不相同。

关键词:自然文本;文本功能;符号学维度;生态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4)04-0122-04

自上世纪60年代末,西比奥克提出动物符号学的一整套理论,并对乌克斯库尔(Jacob von Uexkull)的“环境界”(Umwelt)概念进行“重新发现”以来,西方符号学界就开始了向生命符号学的整体转向。然而,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一生命研究的重要领域,却直到上个世纪末才得以出现。1996年,诺特(Winfred Noth)提出了“生态符号学”(ecosemiotics)的概念。它与库尔所提出的“符号生态学”(semiotic ecology)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后来,为了术语的统一,库尔将“符号生态学”改为“生态符号学”,并将其定义为“探讨人类和他所在的生态系统之间的符号关系”^[1]的学科。可见,对自然之于人类的意义问题的探讨,是生态符号学研究的核心。而自然文本(nature-text),这一从塔尔图-莫斯科学派学派的宽定义文本概念延伸而来的术语,则成为了生态符号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本文将从这一概念的源流和定义出发,对它的功能和符号学维度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

一、自然文本的概念:缘起和定义

当人们谈到文本一词时,往往倾向于将其当作文学作品来进行理解,但事实上,不管是从它的本意

“织就之物”而言,还是从当代符号学对它的普遍理解,即“合一的表意单元”^{[2]41}而言,它都意味着是接收者对一个完整意义的承认和理解。洛特曼认为:“一个文本有开端、结尾和确定的内部组织。按照定义,每个文本的内部均有其固有的内部结构。”^[3]这个定义强调了文本的时间性(开端和结尾),以及特定的结构性(即,它是一个符号组合),这和赵毅衡提出的“符号文本”定义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只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就是符号文本:1. 一些符号被组织进一个符号组合中。2. 此符号链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合一的时间和意义向度。”^{[2]43}应当说,后一个定义更为细致和准确,它将意义的解释权让渡到文本接收者一方,因此使得文本有了更大的开放性。这也和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另一位核心人物乌斯宾斯基(Boris Uspenskiji)所说的文本是“任何可以被解释之物”^[4]更为贴近。

既然文本是文化符号学研究的基本单位,那么文化对自然的映现也就决定了,自然在文化的视角下是被文本化的。这里所说的文本化,并不仅仅从文学或艺术的角度而言,而是将自然(中的一部分)作为合一的意义单元来进行理解。库尔认为:“作为

收稿日期:2014-02-19

基金项目: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720029);西南民族大学2014年度中央高校青年教师基金项目(2014SZYQN31)

人类影响的结果,人类环境界中的自然可以分为一度、二度和三度的自然;我们认为的外在于环境界的自然,可以被称为零度自然(zero nature)。零度自然是自然本身(如,绝对的荒野)。一度自然(first nature)是我们所看到、认出、描述和解释的自然。二度自然(second nature)是我们从物质上解释的自然,是从物质上翻译的自然,即,被改变了的自然,被生产出来的自然。三度自然(third nature)是头脑中的自然,存在于艺术和科学中。”^[5] 库尔指出,这四重自然之间的意义累积、生产和流变,是生态符号学研究的着力点。正是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蒂莫·马伦(Timo Maran)提出了自然文本的概念。

自然是“文本化的自然”,这个看法在马伦提出的定义中得到了反映。他认为:“除了讲述自然、指向自然的书面文本之外,它还包括描述自然环境本身的部分,为了功能关系,自然环境肯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文化性的,或者可以被文本化的。我将把这种在这两者之间的意义关系中形成的单元称之为自然文本。”^[6] 对于如何将作为意义单元的自然环境(即自然文本)作为生态符号学的研究对象,符号学界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以诺特为代表的生物生态符号学研究者,他们主要考察的是生态群落中各种生物体之间的意义关系;二是以库尔为代表的文化生态符号学研究者,他们主要考察的是这种意义单元和人类的意义关系,尤其是和文化的意义关系。马伦采取的是与文化生态符号学一致的立场,即将自然文本视为经过语言调节的文本,它不一定是直接用语言来描述的,但在人类的认知和人类的意义关系中,是以语言为基础的。马伦指出,自然书写当然是最为典型的自然文本,然而,被人们作为意义单元的自然环境(如爱沙尼亚文化中常见的半自然的自然群落,和海滨草坪、树植草坪等),也属于自然文本的范畴。如果我们把后者理解为有意义的符号组合,那么,对这种文本化的自然的考察就可以解释某一文化对自然、对具体的自然物的态度,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自然的意义是如何经由人类的实践活动而调节变化的,这对于生态符号学的宗旨,即,研究自然之于人的角色和两者之间的沟通,无疑是极具意义的。

除了表现自然的文学艺术作品之外的自然文本,即,被我们作为整体来理解的、自然的意义单元,它本身的发送者是不一定存在的,在很多情况下是我们所说的“无发送符号”^[7],意义的产生主要在于作为解释者的人如何加以理解。从这一点上,我们

可以看到“自然文本”的概念和乌斯宾斯基的“文本”概念的扣合,即,文本是被解释出来的。“自然文本”也具有时间性(如,同一个自然文本在历时上的意义和结构变化),而且,自然文本的结构性(如,自然物构成要素之间的位置关系)是生态符号学研究的一个重点:这些特性则是与洛特曼和赵毅衡的文本概念贴合的。由此我们可以说,自然文本是一个理论准备较为充分、兼具理论延续性和突破性的子学科概念。

二、自然文本的功能

在对洛特曼文本概念的进一步拓展中,库尔提出了“生物文本”(biotext)的理论。库尔指出:符号是不能单独被解释的,它必须依靠其他的符号才能得以理解,而这个较之于符号的更大组合,就是文本。这和细胞的情形是一样的——在生命体中,细胞也需要依靠其他的细胞才能生存并发挥作用。细胞之间的信息交换即符号过程,它不是由单个的细胞完成的,而是由多个细胞进行的:这种多细胞的组合,可以称之为生物文本。这是一个生物符号学的基本概念——当然,库尔自己也承认,这个概念无法将单细胞动物包含在内^[8]。但这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在这里,本文将“生物文本”和“自然文本”的概念相并置,是为了通过比较的方式,来阐述自然文本所具有的功能。

洛特曼认为,文本是“完整意义和完整功能的携带者”^[9]。这里说到的完整功能包括三种:一是传播功能,即传播已经完成的信息;二是记忆功能,即将信息进行传承,即使在文本被遗忘或边缘化的情况下,也可以保持能被“激活”的沉睡状态;三是创造功能,即产生新的信息。生物文本属于纯粹“自然”的范畴,它研究的是生物体的“内符号过程”(endosemiosis)如何生成信息意义,它的功能和自然文本这一经由语言过滤、通过文化来映现的基本意义单位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生物文本”和“自然文本”都具有传播的功能,即对已经具备的意义进行传递。在这个传递过程中,文本的信息都是通过符码来进行传播的,这也就意味着,符码与另一种符码的转换之间,是具有边界的。在生物文本中,基本的边界是细胞壁和细胞类型,信息经过不同的生化反应,而转变成不同的符码,从而完成生物翻译(biotranslation),维持生命体的系统调节和功能运转。这个传播过程,尽管不是完全机械式的,但对符码的转换和解释是有着固定形式的,一旦文本的接收方——另一个机能系统

对它进行“误读”，信息就会无法传递到位或是产生错误，就会带来生命体的机能障碍；这种障碍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引起疾病或者死亡，而在极少数情况下则会引发变异。相形之下，自然文本在进行传播时，它首先要经过的边界是自然语，即人类必须通过语言的认知（也就是语言的双重分节功能）来对自然界进行划分，使它从原本模糊不清的状态成为清晰的、可以彼此区别的对象体系。因此，人类对自然文本的认识必然是经过语言过滤的，作为符号组合的自然文本，它其中包含的所指分节是由能指分节决定的。

人类语言尽管覆盖了全域，但各种语言的能指和所指划分差异很大，因此，同一个自然文本在不同语言文化中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民族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相关的，它关注的是某一民族语言对自然环境的系统分节是如何生产了意义特殊的文本。比如，达悟族（也称雅美族）对兰屿周围海域中的鱼类有一种独特的能指所指划分，即，老人鱼/女人鱼/男人鱼，而这种划分又折射出达悟文化中对老人/女性/男性的不同社会文化地位。因此，作为自然文本的这一海域，它包含的符号对象和传播的意义关系，对于具有这种双重分节认知的达悟文化和不具有这种分节的其他文化而言，是相当不同的。

其次，在记忆功能上，生物文本和自然文本也有很大的差异。尽管已经有不少生物符号学家已经指出，生物文本具有记忆功能，但是，库尔认为：“生命体继承了独有的模式和符码，就几个特征而言，这些模式和符码可以回溯到数十亿年之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是有记忆的。但是，这种记忆是没有时间性，或者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时间性的。我们可以将生物记忆中的叙述作为某种发展序列，就像是短篇故事一样，但它们从来没有达到过书本的历史叙述的长度，人们可以从这些书中读到种族发展史，或是人类和文化的历史。”^[5]也就是说，尽管生物文本可以记载生命体内部符号过程，由此建立生命体以后行为的意义机制（如条件反射），或者通过遗传序列，实现DNA的传承功能，但却无法确切地对自身的发展历史进行记录，无法解读的、被“误读”和遗忘的文本信息不能像文化文本那样进入“沉睡”状态，等待合适的语境出现，被重新“激活”。

相反，自然文本具有长期记忆的能力，因而可以将自身的意义传递下去。比如，对某一地区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的相互影响研究，就是这种记忆功能的

体现。在这一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当属赛义夫的论文《自然与文化的相互拟态：从生态与文化的元形态再现视角出发》。作者对埃及文化中的视觉表达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这些视觉表达体现了埃及的生态环境和文化的结构类同性^[10]。这就和洛特曼所秉持的观点，即文本与文化具有结构上的类同性，是一致的。而这种基本结构上的类同性，是文本得以传承的根本原因。此外，由于自然文本包含了作为意义单元的环境本身和表现它的书写文本这两种形态，就算作为自然文本的某个实在的环境受到了破坏甚至覆灭，但只要表现它的书写文本还在，在适当的语境下，它的文本意义仍然有可能被“激活”，甚至导致实在的文本的复兴。例如，在环境保护、生态旅游的语境盛行的今天，不少已经废弃的或被毁自然村落又按照书面文本所记载的样式和形态得以创造性的重建。

最后，在意义的创造上，生物文本几乎不具备生成新意义的功能，而自然文本则是意义的产生器。生物文本传递的信息几乎是固定的，这是由其符码的固定性所决定的；生命体的功能运转是以信息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为前提的，因此，它原则上是不应当产生歧义的。但自然文本中的符号是多语性的，它既包含了语言等离散性符号，也包含了图像等非离散性符号，这种内部符号性质的不均衡就决定了文本本身的多义性。另外，自然文本既然是经由语言过滤的，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翻译转换时，也会产生意义的变形和增加。再者，上文已经提到，自然文本可以分为实在的自然文本和对其进行再现的书面自然文本，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彼此影响，也会造成新的意义生成。

综上所述，自然文本具有洛特曼所描述的文化文本的三种功能特征，它属于广义的文化文本的范畴，我们经由自然文本所体验、所认知的自然，不论是哪种形式，都是文本化了的自然。

三、自然文本研究的符号学维度

美国著名符号学家莫里斯（Charles F. W. Morris）认为，符号学有三个基本的面向：符形学（syntactics）、符义学（semantics）和符用学（pragmatics）。符形学主要是总结符号形态上的共同规律，它研究的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结构关系。符义学关注的则是符号的意义问题，即意义的产生过程，也就是意义的感知、接收和解释^[11]。而符用学关心的，则是符号如何被使用，符号与接收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从这三个不同的维度出发对自然文本进行

的研究,其侧重点也各有差异。

在符形学的维度上进行的自然文本研究,它关注的是在这个自然文本中,符号之间的结构构成和形态、对自然对象的分类、以及自然文本在形态上的符号修辞问题。民族语言学、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的许多研究都和这个领域密切相关,它们尤其关注各种自然语言是如何对自然环境(特别是局部的自然环境)进行文字和图像的分类和再现的,这就是对自然文本中符号的命名(naming)和类别化(categorization)研究,它反映的是使用这一语言的人对这一自然环境的基本认知。此外,实在的自然文本和再现它的书面文本之间的同构性和相互拟态,也是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尤其是再现性的自然文本中使用的种种符号修辞手法,是对文化基本模式的一种探索。比如,中国的传统山水画文本的身体/人格隐喻修辞机制,就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元语言结构不无关系。

当自然文本的研究在符义学的维度上展开时,它主要考察的是,这一文本对人类而言意味着什么,它的意义有些什么流变,以及这种流变是如何产生的。对自然书写传统的追寻,对生态文学文本的细读与剖析,以及对景观等自然文本的意义与影响研究,都属于这一范畴。

自然文本研究的符用学维度,主要是针对实在的自然文本(如某个区域的自然环境)进行的。一方面,它探索的是人的行为对自然环境结构的影响,与

参考文献:

- [1] 卡莱维·库尔,彭佳. 新塔尔图研究:继承、融合与推进——卡莱维·库尔教授访谈[J]. 符号与传媒, 2013(6).
- [2]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3] Ю Лотман.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M]. Таллин: Тарту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92: 84—85.
- [4] Boris Uspendkiji. Anything that can be interpreted[G]//Structure of Texts and Semiotic of Culture. Mouton: The Hague, 1973: 610.
- [5] Kalevi Kull. Semiotic ecology: different natures in the semiosphere[J]. Sign Systems Studies, 1998(1).
- [6] Timo Maran. Towards an integrated methodology of ecosemiotics: The concept of nature—text[J]. Sign Systems Studies, 2007(1).
- [7] 赵毅衡. 符号过程的悖论及不完整变体[J]. 符号与传媒, 2010(1).
- [8] Kalevi Kull. A sign is not alive, but a text is[J]. Sign Systems Studies, 2002(1).
- [9] 彭佳. 另一种文本中心——回应尤里·洛特曼的文本观[J]. 符号与传媒, 2011(3).
- [10] Farouk Y. Seif. Mutual mimesis of nature and culture: A representative perspective for eco—cultural metamorphosis[J]. Sign Systems Studies, 2010(1).
- [11] 皮特·特洛普. 符号域:作为文化符号学的研究对象[J]. 符号与传媒, 2013(6).
- [12] Kalevi Kull, Toomas Kukk & Aleksei Lotman. When culture supports biodiversity: The case of the wooded meadow[G]//Imagining Nature: Practices of Cosmology and Identity.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2003: 76—96.

生态学研究结合得比较紧密;另一方面,它又反过来考察自然文本对人类实际生活、对人类文化结构的影响。例如,库尔等人就对爱沙尼亚的树植草坪进行过考察,他们指出,人类对树植草坪的维护和管理促进了这一自然文本中的物种的丰富性,使其成为一个更为平衡和具有可持续性的生态系统。反过来,树植草坪也成为了爱沙尼亚文化的一部分,它已然成为爱沙尼亚自然传统的一个标志,对当地人看待自然的方式产生着持久的影响,这在爱沙尼亚丰富的自然书写和自然影像作品中都有所表现^[12]。

以上提到的这三个自然文本研究的符号学维度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很多时候,它们相互交织,难以区分。在此提出这三个基本的层次,只是为了在理论上说明它们各自的侧重点和分析优势,使分析者在具体的操作时具有较为清晰的理念,不易混淆。

自然文本的概念源于对塔尔图—莫斯科学派文本观的承袭和拓展,通过将它的功能和生物文本的功能相对照,我们可以看到自然文本应当是属于广义文化文本的范畴,它是建立在人类语言的过滤之上的,具有文化的性质,因此,它是文化符号生态学的一个基本单位。通过对自然文本的符形学、符义学和符号学维度的区分,它在各个领域内的适用性得到了较为清楚的说明。自然文本这一生态符号学的重要概念,将会在日益兴起的广义符号学研究中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